

身当无奈何将隐 事在莫须有更悲

——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

姜维枫

摘要 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可归结为圣裔与圣君价值取向的悖离:孔尚任一生仕宦与才人形象的悖离、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期待与失意的交织等形成其人生的主调——抱怨闲官冷署官微俸薄而牢骚太盛、耽于诗文而荒废政务、真才人而非醇儒;康熙皇帝则欲以任用汉臣、推重汉文化来消解与缓和民族矛盾,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以“经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道统”与“治统”。两相比较,显然圣裔有负圣君特例拔擢之初衷。《桃花扇》的轰动又让康熙皇帝对孔尚任更加失望,因此,圣君只能含糊其辞地示意户部罢其官。康熙皇帝有意识地不加罪于孔尚任,正是圣君的高明之处。

关键词 孔尚任 罢官 疑案 《桃花扇》 治统 道统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20)02-0125-15

作者:姜维枫,女,1972年生,山东威海人,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清初遗民文学。济南 250002

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之罢官,在当时便成为“疑案”。近世研究者屡有考测,有“作《桃花扇》”说、“耽于诗酒”说、“宝泉局贪污”说、“应天乡试案与《通天榜》传奇”说等,都只是推测,各有一定的理由,又都不够圆通。对罢官,孔尚任自己都不知其所以。因此,若一定要考出其罢官的某种因由,便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去强行稽考。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综合孔尚任罢官前后的有关史实和文献,对孔尚任罢官疑案做出不拘于一种缘故的理证。其实,这件“事在莫须有更悲”的疑案,还隐含着更深层的历史底蕴。

—

孔尚任(1648—1718),孔子六十四代孙。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南巡时,孔尚任以曲阜御前讲经被康熙特例授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三十九年(1700)晋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旋即以疑案罢官,这是孔尚任为官的起点与终点。自异数出山至疑案罢官,孔尚任的一生可谓“异数”与“变数”并存。

(一)仕宦与才人形象的悖离

孔尚任于康熙六年(1667)应童子试为诸生,康熙十七年(1678)应乡试未中,康熙二十年(1681)捐纳国子监生,这是孔尚任异数出山前以仕途立命的自主选择。有学者认为孔尚任早年曾归隐,理由有二:其一,孔尚任曾于康熙十八年(1679)入石门山读书;其二,孔尚任曾于书颜修来的信中云“第一室深山,虽不及扁舟渔父,棋傍烂柯人,庶几似之”(《与颜修来》)^①。笔者则不以为然,原因如下:其一,孔尚任为诸生约14年,以31岁大龄乡试未中,情志有些消沉,因之聊发隐逸之情是很可理解的;其二,自古文人言“穷则独善”者,多为抒发归隐情结,真正归隐者寥寥。其三,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年(1681)捐纳国子监生,第二年起即应衍圣公之请出山襄助家族及盛典事务,并于期间多次不无炫耀地称颂皇恩圣眷等,据此可推知其归隐之事虚言不实。其四,孔尚任在写给颜修来的另一封书信中流露其初心:“区区假道学语,何与今事?即文坛骚、雅之言,亦属闲情。独是邹、鲁圣贤之乡,孔、颜诗书之主,必于此处大有斡旋,大有整顿,方不负今日苍生之望!”(《与颜修来》)在这封信中,孔尚任不仅否定了“假道学语”,而且认为“文坛骚、雅之言,亦属闲情”,惟将传习圣学道统视作“不负苍生”之举。可以说“行科举为仕宦传圣学”是孔尚任早期为自己设定的人生走向。

坚定孔尚任“仕宦”取向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对孔尚任的特例拔擢。据孔尚任《出山异数记》载,康熙对孔尚任等“不拘定例,额外议用”,是鉴于“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经筵讲官不及也”。如果说康熙二十三年是孔尚任“仕宦”之途的正向转折点,淮扬三年则是其形塑“才人”“书生”形象的关键点。历史上,康熙极其重视河工,将其视为自己听政之后三大事之一。康熙二十四年(1685)孔尚任奉命入淮扬,显然是康熙皇帝培养历练孔尚任仕途阅历的有意举措。然而孔尚任却辜负了康熙的美意,淮扬三年半的生活,他以亲近文人骚客、接近故老遗民、诗酒唱和、联吟达旦为主务,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记录甚详,此不赘述。纵观淮扬时期,孔尚任偏离仕途改弦更张固然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处在孙在丰与河道总督靳辅的夹缝中,河务屡兴廷议,政务受阻——但从孔尚任诗文创作及《孔尚任年谱》的记录观照,在“仕宦”与“才人”两种形象之间,孔尚任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近“才人”远“仕宦”。此间诸如“药裹经冬同客住,茶烟到晚为诗忙”(《江都董子祠访邓孝威,时选诗观三集》)的情感价值取向,在其诗文中表达得非常明显。再看此间孔尚任朋友诗文中呈现的孔尚任形象,随意拈取两例。宗元鼎诗序云: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仲冬某日,国子博士曲阜东塘孔先生邀四方宾客于扬州之琼花观,宴集赋诗,盛事也。……孔先生奉天子命,治扬州下河政,暇则与诸贤士赋诗雅集,留心于贤士。……^②

王逊雪诗云:

使君真好客,花外敞琼筵。何处蕃釐观,中宵醉管弦。春风生座上,明月到樽前。回首吴陵道,踌躇亦怆然。^③

“风雅才子”“好客使君”,这是宗、王二人诗文中的孔尚任形象。康熙二十九年(1690)初,

① 本文所引孔尚任诗文,如无说明,均据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宗元鼎:《国博孔先生举诗会于扬州琼花观跋》,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67页。

③ 王逊雪:《冬月望日孔东塘使君琼花观大会同人看月》,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67页。

返京之后的孔尚任继续官国子监博士,忙于结交故旧新朋、诗文唱和,一如淮扬。康熙三十一年(1692)其应王士禛招饮作《王阮亭先生招饮,同曹实庵、谢方山、冯大木、袁士旦、蒋京少诸公,分韵得夜阑更秉烛五字》(其五)抒发了此期心曲:

久客惊岁华,怀抱长拘束。既醉重举杯,诗兴纷来触。出山忽八年,松桂不我属。
若无良宴招,何处写心曲?白日多尘埃,联吟须刻烛。

可以说,回京后的孔尚任沿着“才人”的自我形塑之路愈走愈远。康熙三十三年(1694),孔尚任与顾彩合著之《小忽雷》云:

(梧叶儿)喜的是残书卷,爱的是古鼎彝,月俸钱支来不够一朝挥。大海潮,南宋器;甘黄玉,汉羌笛;唐羯鼓,断漆皮,又收得小忽雷,焦桐旧尾。^①

正如文中所言,此期孔尚任虽官国子监博士,却“喜残卷”“爱古鼎”,忙于收购乐器,与流寓京师的失意文人诗酒唱和,“月俸钱支来不够一朝挥”,一副落拓失意“文人”的形象。

康熙四十一年(1702)孔尚任罢官归里,孔传铎作《喜家东塘户部归》诗,颇有趣味:

(其一)忆从奉使到淮扬,天下才人识岸堂。两转户曹仍隐吏,十年京邸一琴囊。
蒲轮异日知重召,松径深山幸未荒。且得共君频酌酒,破除诗债论耕桑。

(其二)词坛声价与云齐,名满京华被谪宜。歌就自成红豆谱,客来频醉绿藤蹊。
归遗老母余清俸,乞得闲身灌小畦。不俟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又鹧啼。^②

孔传铎此诗本为宽慰东塘罢官而作,然其诗题用“东塘户部”之官名,诗歌正文描述的孔尚任却是以“才人”形象在“词坛”立身。非“仕宦”而真“才人”,孔传铎诗无意间完成了对孔尚任立身安命之错位形象的真实记录,这一形象恐怕也代表了时人对孔尚任的形象评价。笔者尝试推论,“为官”却以“文名”,形象错位,是否也是康熙皇帝对孔尚任的认知呢?柳屯田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了仁宗皇帝,那么,康熙皇帝罢免这位“以使槎滞淮扬,与布衣耆旧结鸥鹭之盟”(《盟鸥草序》)^③的孔尚任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

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至淮扬,其身份是官,然其在淮扬却广交遗民文人,宴饮酬唱,情如胶漆。据粗略统计,与其酬唱宴饮者前后当不下百人。处于这样的生活场景之中,恐怕孔尚任自己也分不清自己“官耶”“民耶”的身份了。康熙二十五年八月,甫至淮扬,孔尚任便在《维扬舟中即事》中流露出“为官现实”与“自我追求”的价值悖离:

九重封事信如何,日日江干见雁过。自笑开衙随水部,偏宜鼓棹答渔歌。摩挲倦
眼亲书少,料理新须览镜多。酬报久思无计是,吴天冷雨意消磨。

“自笑开衙随水部,偏宜鼓棹答渔歌”,对“开衙随水部”报以“自笑”,对“鼓棹答渔歌”直言“偏宜”;诗歌流露出自己不宜“为官”、宜为“诗人”的情感取向与尴尬,以及“久思无计是”“冷雨意消磨”的失意现实。随着孙在丰与河道总督靳辅齟齬日起、廷议屡兴,本就对政务不甚了了的孔尚任开始思考“用世”与“避世”“乐”与“弗乐”的关系:

余馆此三阅月,亦未尝不知其境之可乐也。反求吾志,若未甚得者何故?盖境与志合,虽不乐犹乐;境与志违,虽乐犹弗乐也。昔巢许隐箕颍之间,地最枯寂,而志在避世者,处一避世之境,则乐矣。禹、稷胼胝跋涉,非不甚劳,而志在用世者,处一用世

①②③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14,171-172,208页。

之境,则乐矣。余今者来昭阳,避世乎?用世乎?而事势纷更,去留靡定,闲居楼上,朝凭夕眺,城内外百里间,人烟帆樯,鱼鸟芰荷,虽皆足以供觞咏,以余当之,只为增忧益病之具,乃知乐固在志,不在境也。

这是孔尚任至淮扬第二年创作的《海光楼记》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颇有思辨意味,文中作者思考“境”“志”与“乐”的逻辑关系、“用世”与“避世”的选择取向,表达了自己本为“用世”而来,却无所“用世”的尴尬与非“避世”而来却又“去留靡定”的两难处境。

上文曾言,淮扬三年是孔尚任自觉不自觉形塑其“才人”形象的关键期。关于孔尚任形塑自己“才人”形象的原因,是其本就“偏宜鼓棹答渔歌”的先天特质、自愿亲近骚人遗民呢?还是因河署两派不合、屡兴廷议,从而导致其被动地走近淮扬文人,并最终成就了自身的“才人”形象呢?恐怕两者都有。无论是哪一种逻辑,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源头的汇流,孔尚任最终陷于“非官”“非民”的尴尬处境。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辅革职,孙在丰降调,两位主要官员去向已定,孔尚任却被康熙与朝廷晾在河岸之上去留莫测:“孰知两番同事计二十一人,皆得先归,而我之不得归仍然耳”(《与宋既庭广文》)。孔尚任是康熙亲自拔擢并委任至淮扬的官员,此时康熙皇帝沉默则户部自然不宜直接发落。康熙皇帝此时的沉默,当在表达对孔的不满了。孔尚任在《待漏馆晓莺堂记》中写出了这种被圣君“遗忘”的难堪和自己“非官”“非民”的尴尬:

昔贤云:“在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今予且不知其在庙堂也,其在江湖也。

“庙堂”与“江湖”、“非官”与“非民”的身份尴尬,是孔尚任诗文中悲苦的源头之一。创作于淮扬第二年的《除夕同蒋玉渊、陈鹤山、颜遇五、侄衍柅围炉分韵》云:

思亲望国鬓全皤,佳节谁怜野寺过。两度莺花违玉漏,一冬书信阻黄河。筵前真笑平时少,客里贫交到处多。同坐除年心事异,都将眼泪滴笙歌。

康熙二十八年(1689)暮冬,孔尚任离扬州北返时作《与王安节》云:

下河斥卤波涛,为生平第一恶梦;金陵山水文章,为生平第一好梦。……今买棹北上,又作长安痴人,好梦恶梦,皆归无梦矣。别来忽忽如失,总以怀君亲、恋友朋,三心二意,交战于中,所谓神魂颠倒,虽醒犹梦,何时得一把臂以开我倦眼耶?

淮扬三年,康熙本为历练孔尚任之“官性”,孔尚任则将其看作一场为官之“恶梦”。淮扬为官“恶梦”的阴影一直笼罩于孔尚任返京期间。其创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燕台杂兴三十首》(其十)自注,道出了当时的真实心态:“予出使海口,著《湖海集》,每飘泊之感。还京后,又寓海波巷,心窃厌之。阮亭先生为题岸堂。”

黑格尔说:“抒情诗……就是要表现自己,要倾听自己的‘心声’,……在这种内容里心灵感知心灵自己,把所感知的形成观念。”^①我们以此观照孔尚任的诗文,并比较其初入淮扬时“自笑开衙随水部,偏宜鼓棹答渔歌”的心声,可知不宜“开衙”为官,“偏宜鼓棹答渔歌”才是孔尚任最真实快乐的自我。再读孔尚任罢官之后(康熙四十三年)创作的《自寿诗》云:“不晴不雨误秋耕”。诗句是否是对自己“非官非民误终生”的自注呢?只是,孔尚任最终未能自开“倦眼”(孔尚任曾于罢官后第五年即康熙四十四年(1705),写下“还家徒壁依然冷,谁信相如遇汉皇?”(《投宿子小墅亲家宋处士》)“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归家夜坐》)的诗句),

① 黑格尔:《美学》(卷三,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4-205页。

也未能从圣裔与圣君各自的期待与发展取向的悖离中了悟罢官的内涵。

(三)期待与失意的交织

孔尚任的人生有无期待?孔尚任的人生期待是什么?孔尚任为孔子六十四代孙,是为“圣裔”,亦为读书人。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问途是孔尚任最佳的人生走向。这从孔尚任坚持长达14年的诸生身份、31岁仍汲汲于乡试可见一斑。乡试未中的孔尚任虽仕进之情寡淡,但从其于34岁时又“典负郭田纳国子监生”的举措,说明其在短暂的犹豫之后,又重燃仕进的渴望。另外,“礼乐酬宗祖,饥寒恋友朋。故巢无可托,流泪选孤藤”^①的家境,亦决定了仕进只能是孔尚任唯一的人生进径。这一时期,孔尚任在与颜修来的信札中,一方面表达了对仕途的歆羨,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境况的自嘲与否定:“前闻买花扬州,今知结夏西湖,到处有逢迎,省却腰缠之累,令人望跨下鹤,亦生健羨矣。”“弟近况支离可矣,尽典负郭田,纳一国子生,倒行逆施,不足为外人道,然亦无可告语者。”(《与颜修来》)孔尚任捐纳监生的时间为康熙二十年(1681),从时代大背景的角度推测,孔尚任重拾仕途期待或许是受到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词科的激励。康熙言:“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②自康熙二十年(1681)之后,连续三年,孔尚任的人生走向不断与圣裔的家族事务联系在一起,并最终襄助盛典搭上了康熙皇帝的圣驾马车,以“异数”之资得到圣君的眷顾。从后来圣君与圣裔的相遇与彼此的期待看,康熙皇帝对孔尚任的眷顾,让孔尚任对重燃的仕途经济热情持续升温,这从其自撰的《出山异数记》^③中可见一斑:

尚任先至讲案前,北面对立,陈书开卷,用二银尺镇定;御案前,书亦展开,用金尺镇定。两案相距咫尺,上肃容端坐,……讲毕,退。天颜悦霁,顾侍臣曰:“经筵讲官不及也。”

……上面谕大学士明珠、王熙,曰:“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着不拘定例,额外议用。”

(十九日)任抵暮返舍,薰沐焚香,拜告先祠,跪述老母膝前,老母感激皇恩,不觉泣下。甫设晚餐,忽有二使自郡城来,传衍圣公语云:“皇上已驻蹕兖州西郭,问及尚任,可速前来!”任即策骑奔赴。夜二更,至行在。……天明,十九日,送驾北上。一路随驾诸臣,莫不指任曰:“此讲书秀才也。”每晚随衍圣公赴行在候安,即蒙赐茶。

……二十一日早行,憩傍路古庙,上遥望见,遣飞骑来,问:“此队何人?”答云:“衍圣公孔毓圻等,送驾过此。”又问:“有讲书秀才孔尚任否?”答云:“尚任亦在此。”飞骑复命。少顷,遣侍卫来,赐茶各一椀。

……十二月初一日,授官报至:“……孔尚任、孔尚鉉陈书讲说,克副圣衷,应将

① 孔尚任:《癸亥闰六月十日,大水蔽宅,漂没一空,移住祖庙,凡五日始归,赋此志感二首》其二,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34页。

② 《清实录》第四册,《圣祖实录》(一),卷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0页。

③ 本文所引孔尚任《出山异数记》文字,均见汪蔚林主编:《孔尚任诗文集》。

伊等不拘定例,俱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可也。奉旨俞允。”

康熙二十三年(1684),是孔尚任初沐“圣眷”之时。对此张潮曾于《出山异数记·题辞》中有所记述:“……先生以所记《出山异数》相邮示,因备知圣朝尊师重道之隆与君臣遇合之雅。”又《跋》云:“驾幸阙里,史馆中既有《幸鲁盛典》以恭纪之矣,然吾辈伏处菰芦,亦何从得见之乎?今东塘先生自以其所躬被之恩,特详记其始末,俾读书衡泌者,咸不啻躬逢其盛。”^①张潮的辞跋为我们认知这一事件提供了他者视角。我们还可从张潮与孔尚任关于“出山异数记”命名的商讨书札中管窥孔尚任的“异数”心态:

(张潮:)惟“出山异数”四字,其命名似尚未能统括无遗。盖驾幸阙里,自是朝廷尊师重道,超越古今盛举,初非一人一家之事,而史馆所纂修《盛典》(《幸鲁盛典》)一书,又非朝野儒生所能窥见,正赖先生此篇有以知其详悉。而先生之独蒙异数,则又出于寻常一切之上,读之令人感发而兴起。窃欲僭拟易其名曰“幸鲁承恩私记”,庶于篇中所载无复遗义。然仆不敢自专……

……(孔尚任:)《幸鲁盛典》久付史馆;“出山私记”乃一家言也,仍旧名为是。^②

显然,关于如何命名,孔、张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张潮之“幸鲁承恩私记”主要从刻书家的角度,考虑普通读者对出版物的接受,并着眼于圣朝尊师重道、君臣遇合之雅,躬逢之盛,以“私记”补“公记”之不能烛照处。孔尚任否定了张潮“私记”乃一家之言的命名方式,坚持采用“异数”命名,是将表述的重点放在自己被拔擢的“特例”和得到帝王青睐眷顾之“异数”。由此可见,孔尚任内心是非常看重这种“异数”之恩的,否则也不会发出对康熙感恩戴德之心:“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出山异数记》)。而此后对这一来自帝王的具有“异数”眷顾特征的期待,也便在孔尚任内心渐渐生长,甚至到罢官之后仍未熄灭,我们可从其后两次迎驾的诗文中得以佐证。其一是孔尚任于淮扬治河去留莫测之际,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二次南巡,孔尚任江口迎驾,奉召登舟。孔尚任在诗文中表达了对再沐“圣眷”的喜不自禁:“蒲伏迎銮江水头,侍臣招手上龙舟”(《三月三日迎驾至江口,蒙召登舟,赐御宴一盒,恭谢用前韵》)、“最是光辉人队里,龙颜喜顾唤臣名”(《送驾至淮上恭赋》)。其二是罢官之后,康熙四十四年(1705)玄烨第五次南巡,孔尚任随衍圣公迎驾,仍冀有赐环重召之遇。但随之期待落空,遂发出失意的浩叹:“还家徒壁依然冷,谁信相如遇汉皇?”(《投宿孙墅亲家宋处士》)“耕耘未足供亲膳,姓字偏劳记御舟。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归家夜坐》)可见,至此孔尚任内心仍对康熙心存期待,只可惜“圣眷”不再,“异数”难续,“期待”终成“失意”。

从异数出山至疑案罢官再至还归阙里,在孔尚任持续数十年的对圣眷和仕途的期待中,始终贯通交织着的是他的窘况与失意,可以说,孔尚任的为官期待与为宦失意是并存的。在孔尚任初沐圣恩的前一年,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孔尚任应衍圣公之请出山襄理族事,曾以《癸亥闰六月十日,大水敝宅,漂没一空,移住祖庙,凡五日始归,赋此志感二首》诗记录其现实生活:

(其一)敝宅全为沼,隄防夜雨时。飘摇存故垒,梦寐怯危枝。稚子贪梨栗,山妻索布丝。西畴无一粒,又复失耕期。

① 两段引文皆引自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7页。

②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47-148页

(其二)濒死风波后,馀生毁誉增。名山家未就,积雨病相仍。礼乐酬宗祖,饥寒恋友朋。故巢无可托,流泪选孤簾。

在“礼乐酬宗祖”盛典筹备背后,是孔尚任“故巢无可托,流泪选孤簾”的含泪记录。再如记录淮扬再沐圣眷诗《送驾至淮上恭赋》后自注:“昨迎驾江头,蒙撤宴赐食,慰劳再四,万姓观瞻,惊喜传播,淮扬人士,方知孔公为眷顾贤臣,荣宠可谓至矣。”然而,在此荣光一刻的背后,孔尚任却数度因俸不敷用而箪瓢屡空。《得金歌》记录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窘况:

空衙曝背日移午,五冬羊裘三绽补;饥来呼食童不应,亲验行厨但空釜。幕客咨嗟吏人稀,踌躇无计看窗户。吾从大夫肯扣门,信马直造司空府。司空早夜才加餐,一餐未毕三吐哺。我来拜谒口何言,祇有肠鸣似雷鼓。拯饥拯溺大臣心,天下无如博士苦。袖出白金润赤贫,归来马步健如虎。僮仆痴饱笑言稠,主人落箸泪如雨。

《与俞水文》写自己假粟待客:

正拟登楼观海,大集同人,而乃以羞涩客囊,不能为西园兰亭之主,坐失良缘,杀风景极矣。……目今坐客常满,食指日多,呼庚呼癸,未免捉襟,特向大仓假粒粟,亦如涸鲋巧涓滴于沧海,早苗望肤寸于泰山……

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河署易人,孔尚任个人去留莫测,箪瓢屡空还要为筹资北上而奔波:“有家浮雪浪,无手补寒衣。过渡登舟险,谋钱得酒稀”(《江上大风吴云逸至舟》)。而结果却是“雷轰荐福,徒劳往返”(《与黄仙裳》)。《待漏馆晓莺堂记》云:

庙堂之上,议论齟齬,结成狱案,胥吏避匿,视为畏途,即予同事之官,或还朝,或归里,或散,或亡,屈指亦无一人在者。独予呻吟病饿于兹馆,留之无益,去之弗许,盖有似乎迁客羈臣。

《答缪墨书》记录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腊月除夕,作者寓陈家庵的凄苦境况:

寓城南陈家庵,除夕闭门,不闻剥啄者久矣。足下之刺胡为来哉?仆几条穷骨,一段铁肠,愈冷愈坚,愈饿愈劲。虽盛仪种种,奈供食僧厨,腥鲜久谢,谨留豆豉一味,共梅花嚼之。

而就在上文所引孔尚任《送驾至淮上恭赋》后注“昨迎驾江头”诗的前两句则是:“从古星轺,未有饥饿如公者”。可见,淮扬后期的“圣裔”一面满怀期待地讲述“最是光辉人队里,龙颜喜顾唤臣名”,一面却在饥肠辘辘地期待能够得到“圣君”的再次眷顾,以改变自身的官运。回望历史,客观评述,孔尚任诗文中屡屡呈现的“期待与失意交织”的场景,是否形成了孔尚任不能自主命运、一味期待圣君眷顾的讥讽呢?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返京之后。“才营斗米支寒灶,又买肩舆谒贵人”(《新寓》),两句诗歌真实地传递出孔尚任拮据的生活和忙于拜谒权贵的日常,而诗歌呈现出的物质与精神的不均衡,在不自觉间流露出“失意”臣子的真实心境。孔尚任创作于康熙三十四年的《晚庭》“十年南北似浮家,名姓何人记齿牙”,和创作于康熙四十四年的《归家夜坐》“尽道君王能造命,冯唐头白未封侯”,依然在持续诉说对“圣眷”与“为官”的期待与失意之情。

二

每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条件机遇之下,自觉不自觉地塑造自己,个体与社

会、个体与个体、个体自身均难免会存在矛盾与冲突。陶潜生当“八方同昏，道路伊阻”之世，他带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体悟而“归去来兮”，“他不与物竞，以沉静的心情，去追求内心理想的世界”^①。李商隐身处牛李党争的夹缝中，他选择向内心追问：“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或做痛苦的悲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苏轼身陷新旧党争，屡遭贬谪，以感悟“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莫取”来化解人生的矛盾与冲突，其“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之语可谓超然重生。在此，我们无意对古人的生存方式做褒贬评价。但我们也不必爱乌及屋或为尊者讳，因孔尚任诗文创作的成就，而隐晦其面对人生矛盾时所频生抱怨与牢骚的事实。孔尚任在人生的精神层面，自觉选择了孔传铎所谓之“才人”身份，在物质层面，则又自觉追逐其潜意识中的“仕宦”想象。关于孔尚任志于承绪“圣人道统”的意向，前文已引，再看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即初至淮扬时创作的《海陵署中喜故人周石舟千里来访不得消息者盖十二年矣》：

君言“勿复尔，所忧岂贱卑，从军虽云苦，天地尚疮痍。稻粱饱雀鹜，牛后古所嗤。读书坚道力，荣名愧毛皮。谁无封侯骨？显晦概难期。”闻君慷慨语，转侧终夜思。吾亦从军者，碌碌奚所为？

此诗一方面表达了对为宦“显晦难期”的忧虑，一方面清晰地勾勒出了踏入仕途之初不甘“牛后”、期待“封侯”的抱负与想象，同时也传达出“道力”与“封侯”并重的价值取向。然而“无金那溷济时才，……我辈为官亦可哀”^②，当官微俸薄，为官不易的现实与自我的为宦想象背离时，孔尚任却持续地不合时宜地屡生牢骚与抱怨之语。《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诗为心声”，在此我们对孔尚任异数出山至疑案罢官三个时期的“嗟叹”稍加梳理。

（一）入京时期（康熙二十四年正月至康熙二十五年六月）。孔尚任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十八日“乘传赴京”，“（正月）二十八日，升国子先生座。……二月初七日，入礼闱，充誊录官”（《出山异数记》）。同年二月孔尚任即于《乙丑闱中拨闷，和王宪尹韵》诗云：

（其一）骑马过燕市，萧然世外情。殷勤劳帝简，仿佛记臣名。教胄官原美，分帘职又清。草茅逢盛事，归说有余荣。

（其二）花事今如许，愁须向镜探。茶叶分冷署，诗社聚闲官。到纸风流尽，随班礼数难。何时开锁院，惭愧一毡寒。

此诗开篇，作者念念不忘帝王对其青眼有加，可进京后发现所期待的“官原美”，却分明是“职又清”“冷署”“毡寒”，因此“闲官”只能归来愁说“余荣”。另外，我们还可注意到“闲官”热衷于“诗社”闲聚、诗文“风流”，苦于“随班礼数难”，孔尚任内心已呈现明显的“仕宦”与“才人”的苦乐分野，两首诗均落脚于“归说余荣”“冷署毡寒”的抱怨与牢骚。这时的孔尚任入京才仅仅一月有余，而同年八月《中秋待月》诗，更直言：“佳节豪华住帝都，闲官冷署自踟蹰。”

（二）淮扬时期（康熙二十五年七月至康熙二十八年暮冬）。孔尚任对为官与圣眷的期待，上文已言。其实，圣君与圣裔的期待是双向的，不仅圣裔对圣君颇有期待，圣君破格拔擢圣裔

① 赵睿才：《唐代文学隅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② 庞垲：《是日东塘晚至，饮间为述时论，有感成诗用自先韵》，《丛碧山房诗》四集卷二，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24页。

的初衷也是欲借圣裔的特殊身份,以发挥圣教辅政之功(后文详论)。孔尚任入京的第二年(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康熙便命孔尚任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疏浚黄河入海口。康熙曾将河务与三藩、漕运等同,视为自己听政之后三大事。这亦可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后,玄烨一月数次与大臣商讨询问河务的记录可知,仅引几例以间接证明康熙重视河务以历练孔尚任之初衷。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首次南巡视察黄河北岸诸险工程,曾谕靳辅曰:

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历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筹划精详,措置得当,使黄河之水顺势东下……^①

就在此次孔尚任赴淮扬时,康熙谕孙在丰曰:

朕前因巡幸江南,见高、宝、兴、盐、山、江、泰等处,积水汪洋,民罹昏垫,朕甚悯之。应行开浚下河,疏通海口,俾水有所归,民间始得耕种。……督率带去司官等,务实心任事,毋得怠忽扰害;其司道府厅州县等官如有玩忽贻误,及土豪绅衿妄行干预、包揽生事、阻挠工程者,指名参奏。……尔受兹专委,须竭忠尽力,悉心区处,速竣大工,使海口疏通,水消田垦。烝黎复业,以副朕救民至意。^②

康熙对河务疏浚可谓忧心殷殷,孟森曾这样记录描述康熙皇帝:

帝于三藩平后,即亲视河南巡。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两次南巡,皆阅河,益奖谕辅。及是,帝言:“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至今尚存。”……兢兢业业于武功告成之后,在帝尚为盛年,而持重有为若是,可谓有道之气象矣。……圣祖为阅河而始巡幸,亦与高宗之侈游观劳供顿者有不同焉。^③

孔尚任初至淮扬,亦曾心怀圣君与民生,以诗文记录民生之多艰:“己劳而慰人之劳,己苦而询人之苦,乃悉得其煮盐捕鱼之状。”(《西园记》)“今来且三年矣,淮流尚横,海口尚塞,禾黍之种未播于野,鱼鳖之游不离于室……”(《待漏馆晓莺堂记》),“圣主方忧水,乾坤又用兵。遥传江县破,久断贾船行。小丑轻民命,雄风仗帝京。官灯催驿马,今夜走兼程。”(《闻楚警》)后河议龃龉,结成狱案,作为随员的孔尚任政务受到影响,这是他频发抱怨和牢骚的客观原因。但相较于对河务、民生的关心,孔尚任主观创作的诗文中记录最多的却是与遗民骚客的诗酒酬唱。其七月入淮扬,八月即唱出“自笑开衙随水部,偏宜鼓棹答渔歌”的矛盾,九月即访遗民黄仙裳,黄云赞之曰:“殷勤赠答,高义不减古人”(《过访黄仙裳依韵奉答》后注),继之游金山、登焦山,十一月即与冒襄、黄云、邓汉仪、何五云、倪永清、张潮诸文士,宴集于扬州寓所等等。此期丰富的诗文创作中不时闪现“闲官”“官冷”“无车”“无鱼”的牢骚抱怨之语:

碌碌闲官从懒惰,深深古寺易黄昏。(《留赠马右伊》)

官冷偏留湖冻处,家贫还累母残年。人情薄厚今宵见,仕路逢迎几处全。(《除夕感怀》)

盖近时无车、无鱼,较住海陵时又添新花样,大约离唱莲花落不远耳。(《答黄交三》)

马齿日增,碌碌无成。(《答缪墨书》)

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二卷),《康熙朝》(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91页。

② 王先谦:《东华录》卷九,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47页。

③ 孟森:《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0-171页。

一面为官,一面抱怨“闲官”“官冷”成为孔尚任一部分诗歌的内容:“官虽愿做忙何事?诗不能工负此穷。”(《寓邸漫兴南柯梦处》)“官未成时曰竖儒,钱未成时曰铜钣。铜钣赫赫放关行,竖儒到处人白眼。”(《铜钣船》)“年来多以论,无补愧微官。古寺天偏雨,秋衣客竟单。”(《留别广陵诸友》)“职附明伦之末”(《答王安节》)。三年淮扬,“下河斥卤波涛,为生平第一恶梦,金陵山水文章,为生平第一好梦”,“为政”与“为文”,孔尚任分辨得很明白。

(三)返京时期(康熙二十九年二月至康熙四十一年暮冬)。由淮扬返京后的最初几年,孔尚任继续官国子监博士,依然弹奏着牢骚满腹的旧调:“重趋北阙官仍冷”(《中秋前日》)、“还都就冷曹”(《送吴敢山太守之任东莱》)、“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岸堂予京寓也,在海波寺街,其前有青厂,乃先朝牧马处》)、“十年毡破二毛加”(《国子监博士厅》)、“十年南北似浮家,名姓何人记齿牙”(《晚庭》)。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起,孔尚任先后迁户部主事、承德员外郎等职,然诗文中“闲曹”“拙官”的旧调依然弹奏不绝:“闲曹任醉眠”(《三月十四日李彦绳招饮寄园》)“第十五年来拙宦,碌碌无成”(康熙三十七年,《致张潮书》)、“莫笑京华住冷曹”(《己卯人日社集岸堂》)。甚至在晋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时,再度不无抱怨地回忆了为官户部主事的寡淡官味:“仙郎气味淡如僧,掩幔寒春几共凭。风动押帘飘细雪,火添炙砚解坚冰。官厨一饭心常愧,郎署三年道未增。正好从君论古史,莺花隔院恨层层。”(《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

孔尚任的一生就是这样的矛盾,有学者如此总结:其最初因“科举场中失意,气沮而入山;入山之后,却又不惜破产,捐买一个例监;祭告‘山灵’,‘欲结草堂三间为偕隐地’,好像隐居的决心很大,却又在应‘衍圣公’之约出山帮办丧事后,不放过迎接康熙祭孔的机会,追逐一官半职;怀着对清王朝统治者‘犬马图报,期诸没齿’的心情而出仕,却又感到仕途不得意,牢骚满腹;尽管牢骚满腹,甚至动过归隐之念,却又一面哀叹‘官冷’,一面照常做官”^①。废政务,耽诗酒,还要为之庆幸:

牛马缁尘中忽闻明月箫声,十年旧梦,瞥然一现,何快如之?弟寒毡日久,颇不觉苦;非不苦也,见诸大老朝参会议,曝日冒霜,其苦有十倍于弟者。弟每月入衙不过六次,除此皆文酒之会矣,无拘无束,还似扬州。^②

孔尚任矛盾相悖的人生及处世哲学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其相关的诗文创作之中。康熙二十八年(1689),孔尚任过明宫,留有《拜明孝陵》:

夕阳红树间青苔,点染钟山土一堆。厚道群瞻今主拜,酸心稍有旧臣来。石麟碍路埋榛草,玉殿存炉化纸灰。赖有白头中使在,秋晴不放墓门开。

宋寝齐陵尽野莎,英雄有恨欲如何。宝城石坏狐巢大,龙座金消蝠粪多。瞻象犹惊神猛气,禁樵浑仗帝恩波。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

身为“异代微臣”,孔尚任一面称赏“厚道今主”令人群瞻,一面做“酸心旧臣”洒泪玉河。其矛盾的价值取向同样出现在《桃花扇》的创作之中,其一面在开篇称颂康熙朝“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③,表现出歌颂新王朝的姿态;一面又在传奇结尾让柳敬亭唱出那套沉郁苍凉的《哀江南》,为旧王朝唱挽歌。客观地评价,在这一类诗文中,孔尚

① 黄卓明:《有关评价孔尚任的几个问题》,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②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18页。

③ 孔尚任:《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任哀悼旧王朝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马积高先生在评价王士禛神韵诗“避实就虚”的特点时曾言：“然而这种‘不真’，正是王士禛在清顺康间安享盛名的奥秘。因为这种诗既有某种艺术性，却又可不得罪人，更不会触文网。”^①相较之下，孔尚任的诗文尽管表现出对新旧王朝盛衰的矛盾，但对旧王朝感怀的痕迹依然明显，而其内心情感的抒发方式和书写载体，想必康熙不会不有所耳闻与思量。

客观地评价孔尚任为官与为文的实绩，其为官也并非毫不尽职，其于淮扬时亦曾视察河口，诗文对民情客观上有所反映：“船上酒盈盏，船底水漫城。下河无干时，可方离别情。”（《留别海陵诸友，得因见古人情五字为诗五章，章十二句》）在《答王安节》札中也自称：“但出使下河以来，风雨劳瘁，迄无暇日”。返京迁户部主事后，亦曾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给好友吴穆诗的开头记写淮南民情：“又报淮南水涨城，司空见惯亦须惊，湖平未敢浮家住，堤断难教乞米行。”（《吴镜庵之淮南迎妻子》）但我们对其诗题及诗歌表达的情感整体稍加体认，孔尚任此诗的主观表达，是对好友吴穆的依依惜别之情，即吴穆前往之地淮南，正牵动了诗人不堪回首的淮扬旧事，淮南“湖平”的民情只是充当了朋友间惜别之情的背景而已。诗的后四句才是情感的重点：“燕赵人回随雁阵，茱萸节近起乡情。送君谁解琼瑶珮？诗满奚囊依旧轻。”因此，我们综合孔尚任诗文中缕缕不绝的牢骚与抱怨，与其关于为官境况的自我描述“弟每月入衙不过六次，除此皆文酒之会矣，无拘无束，还似扬州”，再与之著作等身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与名动京城“时有纸贵之誉”，以致“内侍索取”《桃花扇》相比，孔尚任政务与诗文的实绩，可谓相去霄壤，“耽于诗文，荒废政务”的评价并未偏颇。

或谓康熙三十六年（1697）孔尚任授为承德郎时，官方的封诰文书曾嘉许其政绩：

尔户部福建清吏司主司孔尚任，经画多才，恪勤奉职，出纳裕公私之职，权衡佐军国之需，劳积有成，新纶宜沛。兹以覃恩，授尔为承德郎，锡之敕命。^②

据袁世硕先生考证，孔尚任这次覃恩受封，是康熙“平定噶尔丹，颁诏大赦，封赏百官”^③。换言之，孔尚任及其妻覃恩受封只是余荫了皇帝大赦天下的按例升迁而已，并非康熙的特别施恩。因此诰文所言必是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故而以此作为孔尚任勤政的佐证也就不足为据了。此外，袁世硕先生考证，康熙三十四年（1695）孔尚任迁户部主事“无疑是此次朝廷各部院属员大升迁、降谪时，由国子监博士升转户部主事的”^④。我们据孔尚任这两次自然大升迁情形推测，则孔尚任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晋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亦极可能同属此类，如此则或可释解孔尚任升迁之后旋即罢官的疑惑。

三

以上我们从孔尚任的角度，主要从其自身形象与创作的矛盾冲突以及牢骚抱怨的心态与人生价值取向等方面，尝试寻绎其罢官疑案的历史内涵。以下再从康熙皇帝的角度，同时切近孔尚任见擢于康熙的特殊身份——圣裔，并将孔尚任罢官疑案放置在康熙年间的大背景之下加以考量，尝试寻绎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另一层历史底蕴。

①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0页。

②③④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35, 135, 123页。

“道统”与“政统”是中国传统社会权力形式的两翼。“道统”代表的是士绅阶层的文化权力和文化话语权,传播的常常是得到历史验证与传统社会支持的孔孟程朱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政统”又称“治统”,代表的则是皇权和官方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道统”与“政统”两者有时彼此钳制,有时彼此借重。“道统”常常借助高调真理“以文化权力对抗政治权力,以超越思想对抗世俗取向”^①,对皇权、官方政策与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政统”则常常依靠强权对“道统”进行打压、拒斥和利用,时而规避“道统”并将其边缘化,时而又借重政治权力兼并“道统”,以实现“道统”为“政统”服务的目的。如宋代士绅阶层“曾经作为文化权力的拥有者,也常常在与皇权的对峙中,运用真理话语来抵制政治权力的压迫。……通过思想文化来解决政治问题,用所谓‘道统’实现对于‘政统’的钳制。”^②但宋明以来,原由士大夫阶层建构并属于“道统”范畴的真理却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至清初“政治权力就相当巧妙地垄断了本来由士人阐释的真理,并使帝王的‘治统’兼并了‘道统’”^③。

清初统治者在建立帝国疆域秩序的同时,也在重建思想秩序,作为异族统治者其面临的棘手难题之一是:如何面对数量上远胜于满人的汉族族群,实现家国认同与文化一统,尤其是在知识思想与信仰系统,如何取得汉族读书人的信赖,建立一套适用于新兴王朝的文化与统治秩序。清初统治者面临的诸如“华夷之分”“满汉文化”“民族国家”“文明制度”等一系列问题,最终要归结为“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回望历史,清初统治者实行“治统”对“道统”的兼并,在策略上由利用到高压,最终到康熙时期的怀柔之策。梁启超曾将康熙的怀柔政策概括为“三着”: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儒、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④。

对照孔尚任自康熙二十年(1681)捐纳监生、康熙二十一年(1682)异数出山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疑案罢官,孔尚任二十年的为官与创作生涯正是康熙皇帝对汉族文人实施怀柔政策之时,亦可谓以怀柔之策实现其“治统对道统的兼并”时期,这就是孔尚任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康熙的怀柔政策首先是建构尊孔崇儒的道统。康熙重用汉臣、对汉族读书人的怀柔政策,既源于康熙自身对汉文化的热爱,也有出于对重建国家秩序“治统”的考量。从个体而言,“右文之主”康熙曾云:“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⑤兴文教首先从尊孔崇儒开始,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四月,康熙即于京师太学文庙致祭先师孔子。六月,理学名臣熊赐履遵旨调奏:“隆重师儒,兴起学校,……慎选耆儒硕德,置之左右,优以保衡之任。……又妙选天下英俊,陪侍法从,以备顾问。”^⑥康熙八年除掉鳌拜,康熙即开办经筵与日讲,自己与朝臣系统深入学习儒家经典“以为敷政出治之本”。康熙对经筵与日讲可谓有初而善终,即使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也从未暂停。据统计,至康熙二十五年结束日讲,康熙一生参加日讲学习达900多次。康熙不仅自己博学多闻酷爱汉文化,而且移风俗兴文教,在治国策略上采取以汉族儒家思想以控制社会思想文化的方略。康熙十七年(1678)开博学鸿词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肆诸经。康熙二十三年(1684)

①②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390,390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⑤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49页。

⑥ 《清实录》第四册,《圣祖实录》(一),卷二二,第309-310页。

在曲阜致祭孔子时,面谕孔毓圻(孔尚任在场)等曰:“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尔等远承圣泽,世守家传,务期型仁讲义,履中蹈和,存忠恕以立心,敦孝弟以修行,斯须弗去,以奉先训,以称朕怀。尔等其祇遵毋替。”^①康熙二十六年五月,玄烨御制孔子碑文曰:“朕惟道原于天,弘之者圣,……孔子生周之季,韦布以老,非若伏羲尧舜之圣焉而帝,禹汤文武之圣焉而王,周公之圣焉而相也。岿然以师道作则,以及门贤哲,绍明绝业,教思所及,陶成万世。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统,惟孔子继续而广大之矣。……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②

康熙尊崇朱熹,推重理学,以实现“治统”对“道统”的兼并。理学自宋仁宗以来逐渐进入官方意识形态,发展至明中后期已弊端百出,其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已呈衰颓之势。清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亟需重建一套汉人信仰的思想体系以维护其统治,与此同时清初的一些理学名臣如魏裔介、熊赐履等屡屡以上书、进讲和劝谏等方式推介理学。很快康熙不仅接受了理学,并且采取重用表彰理学名臣的办法,借重提高汉人思想家的影响以重建理学的“治统”地位。如当时的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汤斌等,一些学术与思想的中坚人物朱彝尊、阎若璩、徐乾学等均受到康熙的表彰和重用。“一方面通过上谕和诏书,一方面通过考试制度,转手接过汉族文化知识传统,用更大的声音和更高的调门推介儒家的或者是理学的思想,‘颁发《性理精义》、《朱子全书》,开紫阳为十二哲’,其中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中,曾经不断地用权力凸显正统,表彰理学而贬斥异端,迫使士人放弃边缘的立场,形成一整套以理学话语包装起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更以制度化的方式在整个社会推行。”^③

以上便是孔尚任所处时代的“道统”与“治统”关系,也是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三年特例拔擢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推论:尽管孔尚任因《桃花扇》而名动京城,但康熙皇帝特例拔擢孔尚任是出于借孔尚任“圣裔”的身份以阐扬圣道、辅助王化的国家需求。对此,我们有更直接的论证。康熙二十三年孔尚任被皇帝特例拔擢,世皆以为因“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出山异数记》),孔尚任亦于《出山异数记》中记录康熙皇帝的公开评价:

尚任进讲《大学》圣经首节。……讲毕,退。天颜悦霁,顾侍臣曰:“经筵讲官不及也。”

再看《康熙起居注》:

毓圻以士子生于僻壤鄙陋,不足以副诏旨,勉令国子生孔尚任草二篇。常书、朱马泰齐至行幄,奏呈御览。上览毕,顾常书等曰:“所撰讲章文字尚未得其精微,其篇末排语平仄亦少不调,音韵无伦。大典关系綦重,不可不加详酌。”……上曰:“尔等可以此讲章与大学士王熙、学士孙在丰共相更定。”熙等遵旨更定论,随呈御览。上称善。^④

由此可见,对于孔尚任所撰之《大学》《易经》讲章文字,康熙皇帝并不满意。那么最终“经筵讲官不及也”的评价,应是建立在大学士王熙和学士孙在丰更定修改的基础上完成的。官记

①④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54,1253页。

② 《清实录》第五册,《圣祖实录》(二),卷一三〇,第398页。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下),第391页。

与私记两相比较,可知康熙皇帝看重的主要是孔尚任“圣裔”的特殊身份而不在学识的高深与否。康熙提倡“经世致用”,曾云:“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①。换言之,康熙一生所学乃“内圣外王”之学,因此,其特例拔擢孔尚任,就不仅仅是出于书生“坐观立论”的考量,而是希望借助对“圣裔”的赏识和优容垂顾,让孔尚任“能够起到阐扬圣道,辅助‘王化’的作用”^②。而一旦书生“圣道”不阐、“王化”不辅,则圣裔即沦为“鸡肋”。

康熙一生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又以“经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道统”与“治统”。满清入关前,理学已弊端百出,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朱学末流则“皓首穷经”,只在“注脚中讨分晓,于书本里练工夫”。对此,明末清初的理学家已开始从理学内部进行反思与批判。明末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学子反对理学末流的谈空说妙,提倡经世致用;继之明清之际的理学正统派如樵亭学派与张履祥,夏峰学派与李颙等对理学自身进行反思,他们提倡“经世致用”“明体适用”的理学观,康熙接受并推重的正是清初理学家提倡的这种“真理学”。康熙云:“宋明季世,人好讲理学,有流入刑名者,有流入佛老者。昔熊赐履,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没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③。康熙认为终日讲理学而言行背谬,是假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④。试举两例:

(二十二日己未)进讲毕,康熙帝曰:“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亦徒有此语耳,欲得其人甚难。”张玉书曰:“此全在居心如何,外貌殊难知也。”帝曰:“一心为公能有几人?”张玉书曰:“人臣能为公为国,则身名俱泰,一涉于私,则名败身裂,究竟于己无补。”

(二十四日辛酉)进讲毕,康熙帝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吻合,此即真理学也。”^⑤

以上两段文字均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康熙于日讲完毕之后与臣子的对话。在康熙帝看来,人臣“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固难,但“为公为国,则身名俱泰,一涉于私,则名败身裂”;理学家往往言行不符者多,若能“行事皆与道吻合,此即真理学也”。联系孔尚任异数出山至疑案罢官身为“人臣”的实际,自淮扬三年起,孔尚任“圣道”不传,广交遗民,诗酒唱和;返京后抱怨闲官冷署荒废政务忙于诗文创作。在康熙看来孔尚任既未传道又无经济之才,圣裔“真才人非醇儒”的身份根本无力实现圣君欲其辅政圣教的愿望。孔尚任“才人”“书生”的价值取向与康熙提倡“经世致用”“明体适用”的真理学观是不相符的。

那么,对于孔尚任“为官”与“为文”的实际情形,康熙皇帝究竟“知”或“不知”?我们再以《圣祖实录》关于康熙对官员的品评为例以推论之:

先是,上谕大学士及部院各衙门堂官等,各将属员贤能者,拣选保举,其才力不

① 玄烨:《御制朱子全书序》,见[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44页。

② 袁世硕:《孔尚任年谱》《前言》,第4页。

③ 《清实录》第六册,《圣祖实录》(三),卷二百六十六,第613页。

④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卷二,第1089页。

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二卷),《康熙朝》(上),第472页。

及、年老有疾者，亦甄别引见。至是，大学士、九卿等，以保举郎中、员外等官四十七员，及甄别者四十二员引见。上曰：“此次参革官员甚多，伊等皆由部院年久升任，原无罪过，老病者著解任，余皆以旗缺补用。此保举官员，朕未尽识，郎中系朕亲用之员，朕皆知之，其员外、主事之中，有年少堪任用者，尔等可再拣选。”寻，大学士等又保举九十五员，引见。得旨：此次参革，郎中员缺，以拣选员外郎开列；员外郎缺，以拣选主事开列，俱视其出缺之先后、历俸之深浅，以次升补；其主事员缺，著将笔帖式拣选补用。再各省有操守清廉、爱养百姓、练达吏事之官，亦著该督抚各举二员或三员咨送，到日奏闻引见。^①

以上关于《圣祖实录》的选文，正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孔尚任迁户部主事时，各院部属员升迁降谪的大背景。由引文可知，康熙对郎中一级官员的政绩还是了解的，对一般官员，则分为年久升任、无罪老病解任、少年堪用等几种情况分别对待。由此推论，康熙不可能完全忘记自己亲自拔擢的圣裔，而且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既可索阅《桃花扇》，则对自己拔擢的圣裔的政绩，自然不会不有所考察。因此，孔尚任所喟叹的“十年南北似浮家，名姓何人记齿牙”（《晚庭》），只可能是圣君对圣裔数度失望的沉默。至此，“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②的实际则为事非“莫须”、“将隐”非隐、“无奈”则真。孔尚任曾亲笔记录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幸鲁时的圣谕：“朕幸鲁地，致祭先师，特敷文教，鼓舞儒学”（《出山异数记》），恐怕只能视作孔尚任的记录而非主观的认知。然观彼时孔尚任亦曾“喘息未属，匍伏阶下，仰听上谕”（《出山异数记》）之情形，再对照其“每月入衙不过六次”“文酒之会，无拘无束，还似扬州”等为官的实际，则我们是否可将孔尚任的“匍伏”与“仰听”纯然视为一种“下”对“上”的顶礼“仪式”而非真理学的“实践”呢？

综括言之，孔尚任“罢官疑案”的历史底蕴可归结为圣裔与圣君价值取向的悖离：孔尚任一生仕宦与才人形象的悖离、非官与非民身份的尴尬、期待与失意的交织等形成其人生的主调——抱怨闲官冷署官微俸薄而牢骚太盛、耽于诗文而荒废政务、真才人而非醇儒；康熙皇帝则欲以任用汉臣、推重汉文化来消解与缓和民族矛盾，以“尊孔崇儒重道”讲其道统，又以“经世致用，实心实证”论其政统，以理学融合“道统”与“治统”。两相比较，显然圣裔有负圣君特例拔擢之初衷（《桃花扇》的轰动让康熙皇帝对孔尚任更加失望），因此，圣君只能含糊其辞地示意户部罢其官；康熙皇帝有意识地不加罪于孔尚任，正是圣君的高明之处。

（责任编辑：西 寒）

① 《清实录》第五册，《圣祖实录》（二），卷一六八，第826页。

② 刘中柱：《送岸堂》，见袁世硕：《孔尚任年谱》，第156页。